

与丝绸文化 之路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陈全力

封面设计:孟德润

版式设计:李永泉

责任监制:程 刚

丝绸文化与丝绸之路

康志祥 李毓秦 主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 插页 181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418—1289—7/G·327

定价:11.2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是我们的“国宝”。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在此后的数千年里，丝绸曾一直为中国独家生产，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象征。

丝绸的发明创造，开创了我们民族文明史的新时代。它的生产和经营，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活方式，也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以重大影响。因丝绸输出而得名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时代，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时期的艰苦经营之后而形成的一条著名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道。它在交流东西方文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一股“丝绸之路热”，建立了一门“丝绸之路学”，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丝绸文化和丝路文化有着十分丰厚的底蕴。它犹如一座富矿，亟待人们开采发掘。中国是丝绸文化荟萃之地。研究丝绸、丝路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丝绸、丝路文化的研究还相当不够，有些方面才刚刚起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本书以“丝绸文化与丝绸之路”命名，旨在对丝绸、丝路文化作一些探索，抛砖引玉，以引起人们对丝绸、丝路文化的关注。

本书共分六大部分：丝绸篇、丝路篇、文化篇、企业篇、老字号及附录。各部分从不同侧面对丝绸文化、丝路文化及丝绸企业文化进行了探讨，其中不乏具有创见的佳作，包含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心血。书的总体框架和主要题目由康志祥、李毓秦同志拟定，然后约定专家、

学者分头撰写。其中大部分文章在“95’西安长发祥丝绸文化节”期间举办的“丝绸·丝路文化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改，部分文章曾在《西安晚报》的“丝绸文化粹谈”专栏上发表。因此，本书不同于一般论文集，可以看作协作研究的成果。

本书由康志祥、李毓秦同志任主编，孙守平、赵逢、吴芳等同志作为编委，承担了部分编辑工作。全书最后的统一修改定稿，由康志祥同志完成。本书的出版，应该感谢参与写作、编辑的同志们，同时也应该感谢全国各地众多丝绸老字号企业和陕西旅游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他们在本书的写作、编辑出版方面都有极大贡献。

中国应该有一批象样的丝绸文化专著，然本书实不足以语此。切望有人继起而完成这一工作，以推动丝绸、丝路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

编 者
1995年12月

目 录

一 丝绸篇

- | | |
|--------------------|------|
| 1. 中国丝绸历史述略 | (1) |
| 2. 古长安的蚕桑丝绸 | (8) |
| 3. 唐代蚕丝业的地域分布 | (13) |
| 4. 唐代丝绸的生产组织与贸易 | (22) |
| 5. 唐代丝绸宝库——法门寺地宫丝绸 | (28) |
| 6. 蚕丝科学技术漫谈 | (32) |
| 7. 再创古长安的丝绸辉煌 | (37) |
| 8. 从历史看西安丝绸业的振兴 | (42) |

二 丝路篇

- | | |
|-------------------|------|
| 1. 丝路长安话丝绸 | (44) |
| 2. 丝绸之路热的启迪 | (46) |
| 3. 汉代的丝绸之路 | (49) |
| 4. 张骞与丝绸之路 | (53) |
| 5. 丝绸之路与唐长安的繁荣 | (55) |
| 6. 新疆出土丝织物与东西文化交融 | (61) |
| 7. 丝绸与古代的中外交通 | (67) |
| 8. 丝路的复兴与西北经济发展 | (73) |
| 9. 丝绸之路与西安经济腾飞 | (77) |
| 10. 谈对丝路文化的继承 | (84) |
| 11. 丝绸之路与外向型城市建设 | (88) |
| 12. 丝绸之路与对外开放 | (90) |

— I —

13. 丝绸之路研究在日本 (95)

三 文化篇

1. 丝绸与民族文化 (97)
2. 丝绸与蚕桑崇拜 (104)
3. 丝绸与中西文化传播 (112)
4. 丝绸文化与丝绸贸易 (118)
5. 丝绸文化与市场竞争 (121)
6. 丝绸文化与消费心理 (125)
7. 丝绸文化粹谈 (128)
 - ① 丝绸的魅力 (128)
 - ② 丝绸历史漫谈 (130)
 - ③ 丝绸的传说 (132)
 - ④ 话说真丝绸 (134)
 - ⑤ 千年丝绸见唐风 (136)
 - ⑥ 唐代长安的精美丝绸 (138)
 - ⑦ 真丝绸,五彩缤纷的世界 (141)
 - ⑧ 唐长安的丝绸贸易 (143)
 - ⑨ 渲染夏季浪漫的丝绸服装 (146)
 - ⑩ 丝绸文化随想 (148)

四 企业篇

1. 丝绸·文化·企业 (150)
2. 议古城老字号优良传统 (159)
3. “老字号”的启示 (165)
4. 塑造商业文化 促导丝绸贸易 (170)
5. 论丝绸企业的形象设计 (179)

6. 对丝绸企业文化的哲学思考	(184)
7. 企业文化刍议	(189)
8. 改革与企业文化建设	(195)
9. 丝绸企业管理与心理学	(199)
10. 浅议真丝大王的营销	(205)

五 老字号

1. 丝绸与“祥”字老字号	(209)
2.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	(214)
3. 天津瑞蚨祥商贸公司	(218)
4. 济南瑞蚨祥绸布店	(222)
5. 北京丝绸商店(谦祥益)	(225)
6. 青岛谦祥益商厦	(228)
7. 武汉谦祥益日用工业品批发站	(230)
8. 西安长发祥纺织品大楼	(232)
9. 苏州乾泰祥绸布商店	(238)
10. 济南隆祥布店	(241)
11. 上海协大祥绸布店	(243)
12. 上海老介福商厦	(248)

附录：

1. 丝绸·丝路文化研讨会综述	(251)
2. 祭蚕·亲桑 ——古乐歌舞剧蓝本	(256)
3. 诗二首 ——赞古丝绸之路	(261)

中国丝绸历史述略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丝绸与我们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中国丝绸已经历了五千多个春秋。它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了中国丝绸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国丝绸的渊源可以追溯很远，但其产生的确切年代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浩瀚的古代书籍中，有关蚕和丝绸起源的传说很多。如西汉杨雄在《蜀王本纪》中说：“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南宋罗泌在《路史》中说：“伏羲（氏）化蚕桑为丝帛”等等。在众多的传说中，流传最广的是“蚕神献丝”和黄帝的元妃嫫祖教民养蚕取丝的故事。“蚕神献丝”讲的是，相传在四千多年以前，轩辕黄帝在举行庆功会时，有一位美丽的姑娘自天而降。她手捧一束黄色和一束银色的光泽悦目的蚕丝，并把它献给了黄帝。黄帝高兴极了，立即派人把它织成轻软如云的细绢。后来，这位献丝姑娘，就被人们尊为“蚕神”。关于嫫祖是养蚕的创始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隋书》上。北宋刘恕著的《通鉴外记》中也明确地说：“西陵氏之女嫫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以后宋、元学者反复传抄这种说法，似乎已得到了公认。这种说法既无充分的史料支持，又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并不可靠。但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神话虽非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却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只要剔

去后人加上的一些神话色彩，还其本来面目，基本上能反映我国原始社会某些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状况的。这些古老传说，反映出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时代，我国就由采集野蚕茧，发展到用一定方法饲养家蚕了。

根据考古学发掘，在新石器时代的骨器、陶器上发现了类似蚕的图案以及石制的蚕形装饰品。一些专家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中期，我国就开始养蚕取丝织绸了。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起完整的奴隶制度的朝代。商代甲骨文里，已经出现了蚕桑丝帛等象形文字。商代古墓中，也发现了用玉石雕成的形态逼真的玉蚕和精制暗花绸以及绚丽的刺绣残片。这说明商代丝绸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商代不仅有了从事农业的奴隶，还有为数众多的手工业奴隶和专业化分工。当时设有一种官吏，称为百工（又称百执事、百官），由他们率领工奴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形成了他们的终身职业。这种专业化分工，使百工和工奴积累了生产知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操作技巧。技术的进步，使商代丝织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使商代文化达到空前的水平。到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化，丝绸生产得到大发展。当时中国分成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其中六个州的贡品中都有丝织品。其它冀、雍、梁三州贡品中虽然没有丝织品，但一些地方亦有丝绸生产。《诗经》中《豳风·七月》就描写了今陕西省境内老百姓种桑、养蚕、织绸和染色的生产活动。“豳”是在陕西省境内，而雍州是指秦岭以北的地区，包括陕西省。这说明当时桑、蚕、丝、绸的生产已经在全国铺开，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丝绸的花色品种也丰富多彩，主要有绢、绮、锦三大类。锦是以彩色丝线织成有花纹的织物，彩纹并茂，华丽多姿，是丝绸中最为精巧复杂的品种。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郊左家塘出土的深棕色地红黄菱纹锦、褐地矩纹锦、褐地红黄矩纹锦、朱条暗花对龙对凤锦、褐地双色方格锦、褐地几何填花燕纹锦

等等，采用的是经二重、经三重组织，色彩有朱、棕、桔、土黄、茶色等等，有鸟兽纹图案，形态逼真，显示出织工丰富的创造力。

锦的出现，在中国丝绸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优秀的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丝绸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是很深远的。

到了秦汉时期，丝织业进一步发展。汉代提倡“农桑为本”，使得蚕丝生产的规模和技术得到飞跃的发展，在全国出现了一批丝绸的重点产区和城市。山东以“齐纨鲁缟”而闻名。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则被誉为“锦绣襄邑”。成都自古被称为“锦官城”，以出产“阿丽纤靡”的蜀锦而驰名全国。汉代丝织品中，尤以“织锦”最为著称。其图案多以栩栩如生的动物和流动自如的云气为主，构图丰满严谨，都是以多种彩色的经丝织成的，代表了汉代丝织物的最高水平。1972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多达一百多件以上，有的纱料质轻而薄，一件素纱禅衣还不到一两重。由此可看出汉代丝绸的品种、质地、花纹、颜色和技术的概貌。

汉代是中国大规模向外扩展影响的时期，丝织物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大量丝绸运往西域、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汉武帝曾于一年内征集丝帛五百万匹，由此可以想象丝绸贸易的盛况。汉王朝除了每年定数或临时赠送匈奴丝绸外，还在长城险要关卡处设立关市，即边境贸易。市场上，丝绸是最重要的商品。中国一匹缣，能换回匈奴累金之物，匈奴的牲畜、狐貉、璧玉等源源流入中国。在东北部乌桓、鲜卑与中原之间也有这种关市。这种贸易对中原和边疆、中国和东西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向北方匈奴和西方输送丝绸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从古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一直西去，是中国丝绸输出的主要通道。沿着丝绸之路，西去的是丝和丝织品，还传去了中国的炼钢术、凿井术等科学文化技术，东来的有马匹、苜蓿、葡萄、蚕豆，还有乐曲、乐器、希腊罗马的绘画等等。在人类文明史上，因丝绸贸易而兴起的东西方

人民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豪强之间的大混战，使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的破坏，部分士族和劳动民众迁移至长江流域避难，造成了南方丝绸业的兴起。至隋朝文帝杨坚时期，长江流域经多年开发，经济上升，已能和黄河流域相比。中国蚕桑丝绸业的生产重心由此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在史称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政治清明时期，唐代的丝绸生产，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唐代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上较前代大大扩充了。唐代的宫廷丝织工场有三种，一是由少府监管辖的织染署，主要任务是生产天子、太子及臣子的冠冕，设在西京长安；一是尚功局，专管宫内衣服裁制、金玉宝货、彩物缯锦丝枲等事务，也掌握一些丝织工场，设在皇宫北部；一是掖廷局，设在皇宫西部，掌管宫禁女工事务、教宫女习艺等。这些宫廷丝织工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其内部分工周密而细致，标志技术的成熟与技术力量的雄厚。唐政府实行“均田制”等强制农民从事蚕桑的政策，对丝织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私营工场的发展也有了一定规模，有的私营工场一家就有绫机五百张，规模相当可观。

唐代的丝绸对外贸易非常发达，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北与巴蜀中原等地贸易的枢纽，又是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都市，西市、东市的贸易极为繁盛。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为最多。这些外国的客商以带来的香料、药物卖给中国官僚，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在唐代，西去的丝绸之路上增辟一条新线——北道，即从尹吾西行，经北庭、轮台、弓月至碎叶。北、中、南三线畅通，唐朝势力远出葱

岭。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精美的丝绸从长安出发源源西运，受到西方人的赞美和喜爱。据说，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与黄金等价，罗马贵族以穿上中国的丝绸为荣。随着频繁的交往，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的技艺也传向四面八方。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落。在这期间，中国丝绸有过短暂的辉煌。北宋王朝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发展蚕桑生产的措施，对工匠的控制也不象唐代那样严格，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突破，蚕桑生产技术得到了总结和推广。秦观的《蚕书》、陈旼的《农书》、楼璕的《耕织图》和《梦粱录》等，对蚕桑生产技术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当时的蚕桑生产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蚕桑技术的进步，宋代蚕桑生产地域已遍布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南宋时由于战争和水灾的破坏，我国蚕桑生产的重点由黄河流域转移到江浙一带。四川的蚕桑也有所发展。在北宋时，江浙四川等地上贡的丝绸已占全国的三分之二。由于南北技术的交流，丝绸花色品种有明显的增加，花型图案、产品质量和风格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宋锦、缂丝和饰金织物是宋代丝绸中出现的三种有特色的品种。宋锦产于江浙一带，其组织为经二重、三枚斜纹地、纬丝显花，主要用于装裱书画。缂丝是一种珍贵的丝绸艺术品，在花纹部采用通经回纬的方法织成。缂丝没有通纬，因而在花纹和地纹的连接处出现明显的断痕，象刀刻一般，故而得名。我国古代素有用金银装饰服装的习俗，到了宋元时期，金饰织物的数量大增。由于是尊贵和权势的象征，民间百姓是被严禁穿着的。其作工之精细足可表现我国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

明清两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对我国丝绸生产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丝绸生产的商品化已经出现。如浙江湖州的蚕丝不仅供应苏州、杭州，而且输送到全国各地，实现了手工业地区和原料产区的分离。民间丝绸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有明

显的增长，一些地主兼营手工业，一些商人不仅贩卖丝绸，而且自家买茧开车缫丝。而城市小商品生产者通过竞争和分化，少数人也上升为富饶的机户。此外，丝绸的海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明代初年，海外贸易由官府垄断。隆庆之后，海禁有所松弛。由于生丝和绸缎海外贸易的利润颇丰，浙江、福建有些走海贩货的商人，顶着朝廷禁令，铤而走险。有的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商贾，海船成百，规模很大。

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已经趋于没落。腐朽的封建统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也阻碍着丝绸业的发展。政府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血腥压榨，使得民间机户、机工、丝农连连亏本，以至于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更谈不到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高利贷和封建地租却吸引着资本，使资本不能投入丝绸业，丝绸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而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业革命使传统的手工劳动被动力机械所代替，织造业发展很快，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向外扩张。中国成了它们掠夺原料、推销商品的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绸倾销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丝绸业才完全摆脱了穷途末路的命运，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党和国家积极扶持蚕茧丝绸业的发展，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建设一批新的丝绸联合企业，促进蚕丝品位的提高和丝绸质量的提高。仅1958年，我国绸缎新品种就达一千三百多种，新花色一万二千多个，丝绸出口量是解放初期的十倍。富丽堂皇的金银线提花织物，豪华绝伦的浙江东风绸、新颖别致的上海星光绸等，都是当时风行世界的品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丝绸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蚕农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丝绸业得到迅速发展，在产量、质量、外贸销售量、花色品种以及生产能力方面，均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从1980年到1990年，我国的生丝产量从3.6万吨上升到5.7万吨，增长了1.58倍。与此同时，丝织物的产

量也在10年间增长了2倍多。国内丝织品消费量也从4亿米增长到12亿2千万米,增长了约3倍。我国出口的生丝占世界生丝贸易量的80%以上,绸缎也要占到50%上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又争得了在世界丝绸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丝绸业成为国家的创汇支柱产业。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丝绸将放出更加灿烂的光采。

(作者:澎博,西安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员)

古长安的蚕桑丝绸

长安素以帝王之都著称，而人们对古长安的蚕桑丝绸知之甚少。其实，古时候的长安，人杰地灵，蚕桑丝绸业十分发达，在中国蚕桑丝绸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长安植桑养蚕之古风

传说中发明“育蚕治丝，制做衣裳”的黄帝元妃——西陵氏之女嫫祖，就出生在长安以东的白水县境内，嫁黄帝轩辕氏之后，一直随黄帝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中部（今黄陵县一带），死后随黄帝葬于桥山。

《诗经·秦风》有云：“阪有桑，隰有杨”，“交交黄鸟、止于桑。”《诗经·豳风》中也有《七月》诗唱道“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斫，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鶲、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豳者，地名也，在今旬邑县之西南及彬县一带，周人在迁至周原之前，便居住在豳地。诗歌不仅描写了当地妇女辛勤采桑养蚕的情况，而且反映了纺织时间和丝织物的颜色。

《周礼·天官》篇有“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的记载，意思是说，中春四月，周王诏王后，命其率领诸侯命妇参加养蚕典礼，为了要用蚕丝做祭服。这些礼节的目的在于显示王室对蚕桑生产的重视。中国古代以周代礼仪为正统，《周礼》、《仪礼》、《礼记》三部记载周代礼制的书合称“三礼”。既然“三礼”规定祭蚕亲桑，后世谁也不敢违反。作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的长安，自西周以来有一

千多年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历代在长安建都的王朝莫不纷纷效法西周礼仪，在都城长安郊外举办盛大的祭蚕活动。

《三辅黄图》引《汉宫阙疏》上说：“‘上林苑有茧馆’，盖蚕茧之所也。”上林苑是西汉皇家禁苑，北起渭河之滨，南至终南山下，规模非常宏大，其茧馆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郊鱼化寨附近。《汉书·元后传》也有“春幸茧馆”的记载。《汉旧仪》中则详细记载了西汉时皇后在上林苑亲桑的情景：“皇后春桑皆青衣，采桑以繅三瓮茧，群臣妾从。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群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此说明，汉时长安上林苑内无疑有大片桑林，而帝王后妃每年去那里作一些象征性的采桑喂蚕活动，以表示对这一事业的重视。

《隋书·礼仪志》也有“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至蚕所，以一太牢（祭祀时用的牛）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隋制……季春上巳（三月上旬巳日），皇后服鞠衣（黄色衣服），乘重翠（深绿色的车子），率三夫人、九嫔，内外命妇以一太牢制、币（绸缎）、祭先蚕于坛上，用一献礼。”《旧唐书》上也有“季春吉巳，祭先蚕于公桑，皇后亲桑”的记载。

以上史料说明，西汉时长安上林苑中确有规模宏大的桑林和茧馆，到了隋唐时依然存在，只是改称蚕所、桑坛、公桑罢了。皇室尚且如此，民间的养蚕治丝活动之普遍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古长安的丝绸生产与贸易

古长安一带不仅植桑养蚕风气浓厚、而且治丝织绸生产也非常发达，尤其是西周和汉、唐时期更为突出。

《周礼》所记载周代王室官制中，与丝绸生产有关的官吏很多。“典妇功”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掌管宫内妇女劳作的官吏，其职权是教授宫内的九嫔、世妇、宫女等生产丝和绸的技术，掌握规范的操作方法，并给妇女派工，检查秋天妇女上缴劳动成果的质量，按照数量多少，品质优劣给予奖惩，并作记录。典妇功下又分设“典丝”、“典枲”、“司内服”、“缝人”、“染人”等五个部门。“典丝”专管丝绸原料，到开工生产时还负责发放。“染人”专管染丝、染绸。“缝人”专管缝纫。“司

“内服”专管王和后的“六服”以及内外命妇的服装，逢丧事大典要负责丧服等。这些部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编制都有明确规定。这说明远在西周时，古长安已经有了劳动组织和分工严密细致的专业化丝绸生产机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在汉代才确实巩固起来。汉政权通过实行“农桑为本，重农抑末”的政策，把蚕桑放在仅次于农业生产的地位，促使蚕丝生产的规模和技术得到飞跃发展，在全国出现了一批丝绸重点产区和城市。丝绸品种丰富多彩，丝绸生产技术有很大创新。汉长安就是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城市之一。汉朝建立以前，曾收容掳掠的妇女从事织绸劳动，及至汉朝统一全国后，在都城长安创立织室生产丝织品，这种织室随着汉帝国的发展而扩大。《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有东织、西织。”《三辅黄图》上说“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提花织物和刺绣)郊庙之服，有令史；”“暴室，主掖织作染练之署，谓之暴室、取暴晒为名耳，有啬夫官属。”这是典型的宫廷工业。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北郊西马寨村的汉城遗址区发现的一颗“织室令印”铜质印章，便是当时的遗物。在汉长安，除宫廷建织室，设令丞专司丝绸生产外，在官府和民间的丝绸生产也得到大发展。例如，《西京杂记》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意思是说钜鹿(今河北平乡县)人陈宝光之妻，使用有一百二十个牵线镊子的织机(目前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复杂的手工提花织机)、六十天可织成一匹式样新颖的葡萄锦或散花绫，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便把她召至长安家中为自己织作。

汉代又是中国大规模向外扩展影响的时期，自汉武帝命张骞通西域，打通著名的丝绸之路后，丝绸成为西域、中亚一带与汉王朝“朝贡贸易”的主要获取物和各国商贩长途贩运的对象。这样，汉长安又成为当时第一个国际丝绸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大都市和集散地，丝织